

東方

文化集成

季羨林 主編

東南亞文化編



印度尼西亞文學史

梁立基 著

下冊

昆仑出版社



印度尼西亚文学史

下册



梁立基
著

【东方文化集成】

《东方文化集成》为季羨林教授所倡导，由中国东方文化研究会和北京大学东方学研究院联合组建的编委会负责组织撰写出版。

这是一项迎接二十一世纪东方文化复兴和再创辉煌的世界性文化工程。

本书的出版得到“北京大学创建世界一流大学计划”的经费资助。

本著作作为北京大学“十·五”、“211工程”建设项目成果。



第一节

印度尼西亚的近代殖民地社会

19 世纪的 70 年代,印度尼西亚历史开始进入近代期。这时,荷兰国内的工业资本和金融资本有了很大的发展,统治阶级内部就殖民地的掠夺和剥削方式出现了尖锐的矛盾。在印度尼西亚殖民地实行的强迫种植制显然大大限制了荷兰工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的进一步发展。殖民地的人民也由于强迫种植制的实施而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大量最肥沃的土地被侵占,40 年代连年发生饥谨,1849—1850 年中饿死的居民达 30 万人以上。强迫种植制已经走到了尽头,荷兰殖民宗主国不得不改变对殖民地的掠夺和剥削方式,于 1870 年颁布了《糖业法》,取消甘蔗的强迫种植制度。同年,又颁布了《土地法》,宣布凡不能证明其所有权的土地均归国家所有,政府可以把土地租赁给任何私人资本,期限 75 年,土地私有者也可以把土地租给外侨,期限 25 年,但不能出卖。这就是荷兰在印度尼西亚实行的所谓“自由主义”的新殖民政策。这个新殖民政策为荷兰和欧洲的私人资本进入印度尼西亚大开方便之门。随着苏伊士运河的开通,西方的私人资本开始涌入印度尼西亚,荷兰的爪哇银行、荷兰商业银行、涵塘银行、殖民银行以及各大公司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很快就控制了印度尼西亚殖民地的经济命脉。而荷兰殖民政府也从“自由主义”政策中获得大量好处,每年的总收入结存 5000 万盾以上。

荷兰实行“自由主义”的新殖民政策后,印度尼西亚便逐渐成为西方资本输出的场所、商品倾销的市场和廉价原料及劳动力的来源。随之,印度尼西亚殖民地社会也开始发生历





史性的变化,由旧封建割据的殖民地社会逐步过渡到半封建的近代资本主义殖民地社会,其时代特征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西方资本的涌入把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带进了印度尼西亚,使印度尼西亚经济开始从分散的自然经济向统一的市场经济过渡,成为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附属部分。为了给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提供必要的条件,各种近代化基础设施的建设蓬勃地开展起来。1873 年建成第一批铁路,三宝垄——梭罗线和巴达维亚——茂物线。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铁路的总长度已达 3500 公里。1873 年雅加达的丹戎布绿第一个近代化港口建成,随后几年,泗水、望加锡、勿拉湾等地也纷纷建造同样的近代化港口。1882 年出现第一家电话公司,几年后建立的电话公司多达 34 家。近代化的资本主义企业和种植园也迅速发展,垄断了石油、矿产、橡胶、椰油、蔗糖、奎宁等重要的经济部门,其中从加里曼丹石油起家的荷兰皇家贝壳石油公司后来发展成为世界最大的石油托拉斯之一。这意味着 19 世纪 70 年代西方先进的生产力和管理技术开始被大规模地引进印度尼西亚。然而,市场经济的建立还需要开辟遍及全国的大小商业流通网络,而这又必须依靠勤劳勇敢、不畏艰险、富有拼搏精神而又善于经营的人去开拓。根据当时的历史条件,定居印度尼西亚的华人最具备这种素质。他们披荆斩棘,足迹遍及穷乡僻壤,建立了全国的商业网点,使市场经济得以迅速发育起来。所以印度尼西亚华人对推动印度尼西亚从自然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其功不可没。印度尼西亚华人已成为全面参与推动印度尼西亚社会朝近现代社会发展的积极力量。

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市场经济的建立使印度尼西亚





殖民地社会发生了结构性的变化。首先是出现相当规模的产业工人队伍和从破产农民中转来的大批种植园工人。他们是印度尼西亚殖民地最早的无产阶级队伍,而他们面对的剥削者主要是西方资本家,因此在他们身上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交织在一起。当民族矛盾逐渐上升为主要矛盾时,他们便成为印度尼西亚殖民地最早民族觉醒的一员。与此同时,市场经济也使一部分原住民走出自然经济的世袭领地,从封建地主转变成近代地方工商业者,后来逐渐演变成为最早的民族资产阶级。他们的发展也受到殖民主义的严格限制,当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时,他们也就成为印度尼西亚殖民地最早民族觉醒的一员。在印度尼西亚历史舞台上,这两个阶级的出现是现代民族觉醒产生的前提。印度尼西亚的民族觉醒可以说酝酿于近代而产生于现代,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印度尼西亚的近代期是印度尼西亚民族觉醒从自发走向自觉的一个过渡期。新殖民政策实施之后,印度尼西亚的生产方式发生了质的变化,生产力有了很大的发展,但是印度尼西亚社会仍然是畸形的殖民地社会,它是建立在种族歧视和种族压迫的基础之上,整个社会的结构呈金字塔形,中间有条不可逾越的种族界线。西方白人,后来也包括日本人,居于种族界线之上,享受殖民特权,是统治者和压迫者,可以作威作福。原住民、华人和其他有色人种居于种族界线之下,丧失平等权利,是被奴役者和被压迫者。种族界线把二者严格隔开,由此民族矛盾便不可避免地要成为整个殖民地社会的主要矛盾。

三、东西方文化的正面冲撞和西方文化影响的上升。过去西方和荷兰殖民者着重于经济掠夺,对印度尼西亚的封建社会文化没有正面的触动,而印度尼西亚的封建统治者及其文人对西方文化大都采取排斥和抵制的态度,因此西方文化



文学对于印度尼西亚的古典文学几乎没有什么影响。实行“自由主义”的新殖民政策之后,不仅引进了西方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也把西方资本主义文化带进印度尼西亚封建社会的“土围子”里。荷兰殖民当局开始兴办学校,说是为了“勿使政府丧失教育方面的控制权”,而实质是要为新殖民政策培养多少受西方教育的所需人才。另外,大批西方殖民官吏、工商业者、自由职业者、传教士的陆续到来也促使印度尼西亚殖民地白人社会的壮大,他们的文化和生活方式完全不同于当地原住民的传统,甚至形成了鲜明的文化反差。而受雇于西方殖民政权机构或工商企业的原住民文人也有机会直接接触到近代的西方人士及其文化和思维方式,从而对西方文化有了感性的认识。从现实的对比中,他们看到了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先进性和本民族封建主义文化的落后性,于是有人开始进行西方文化的启蒙宣传,要求本民族向先进的西方文化学习,摒弃封建落后的旧文化。这种东西方文化的冲撞也开始反映到近代的文学创作中,出现了公开宣扬西方文化先进性的作品。后来西方文学作品也陆续被介绍过来,从内容到形式给印度尼西亚近代文学的发展以深远的影响。

四、过去印度尼西亚的历史是各王朝各据一方的分散历史,没有出现过“一统天下”的局面。19世纪70年代后,市场经济的发展必然要促使全国统一市场的形成,封建割据和各自为政的闭关自守已经不可能了。为了建立全国统一的市场,必然要求有一个全国统一的行政管理,“荷属东印度政府”的建立就是为了适应这一需要。从此整个印度尼西亚便置于统一的行政体系之中。这也就是说,在印度尼西亚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一统天下”的局面,尽管它是荷兰殖民统治下的“一统天下”。这种“一统天下”的局面在客观上把整个印度尼西



亚变成了一个“统一体”，而这个“统一体”又为印度尼西亚现代统一民族的产生奠定了基础，这恐怕是荷兰殖民统治者始料所不及。

五、近代马来语为民族统一语言——现代印度尼西亚语的诞生准备了条件。全国统一市场的形成使各族和各地区之间的商品交流和贸易往来日益频繁，这就需要有能沟通各族的语言作为各族间的交际和传递信息的工具，而近代马来语实际上已担负起这个职能。语言是文化文学的载体，近代马来语逐渐成为各族间的统一语言，这就为建立印度尼西亚统一的民族文化文学成为可能。而当出现现代民族觉醒时，马来语便顺理成章地被推举为全民族的统一语言，改称印度尼西亚语，成为印度尼西亚现代文学统一使用的文学语言。

从以上几点来看，印度尼西亚的近代期显然具有过渡性的时代特征，它是印度尼西亚历史发展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阶段，是印度尼西亚走向现代的历史起点，从政治、经济、文化等诸方面为印度尼西亚的现代民族觉醒准备了必要的条件。

第二节

印度尼西亚近代文学概貌

印度尼西亚的近代文学是在东西方文化冲撞中从旧文学向新文学转型的过渡性文学。它产生于封建的旧殖民地社会向半封建的现代殖民地社会过渡这一重要的历史时刻。它所跨的年代最短，从 19 世纪的下半叶到 20 世纪的初叶，前后不过半个世纪左右，但它是新旧文学的转折点。印度尼西亚近代文学发展的走向是：从地方化的分散性文学走向全国化的统一性文学。过去印度尼西亚长期处于自然经济中的封建割



据状态,其文学是由各地方的各族语言文学所组成,深受印度文化和伊斯兰文化的影响,彼此间虽互有交流和渗透,但各有自己的传统,自成一体。转入市场经济之后,随着全国统一市场和统一局面的形成,马来语逐渐成为各族间的交际工具,于是开始出现跨地区和跨族的近代马来语文学,它在内容上和形式上受到西方文学的影响,与旧马来文学有了质的区别,成为印度尼西亚近代文学的主流。

马来语本是印度尼西亚多民族中的一个民族语。伊斯兰文化文学传进来之后,它成为马来古典文学的文学语言。这种古典马来语通行于宫廷和文人的范围内,被人称作“高级马来语”。另外,在19世纪的70年代,由于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另一种通俗的马来语流行于市场,成为各族人的交际工具,被人称作“市场马来语”或“低级马来语”。这种通俗的马来语带有混杂语的特点,多为非马来族人所使用,尤其土生华人和土生印欧人多以它为自己的母语。这种通俗马来语起初很不规范,发展成为新闻语言和文学语言之后不断得到丰富和提高,成为通行于全国的近代大众化的语言。只要是跨地区和跨民族的交流无不用它作为工具。所以,全国性报刊也都用它作为媒介语,对印度尼西亚民族统一语言和统一文化文学的形成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印度尼西亚的近代文学就是用近代“高级马来语”和“低级马来语”写的,反映印度尼西亚近代殖民地社会的基本矛盾和现实生活。

近代马来语文学中使用“高级马来语”的被人称作“高级马来语文学”,它是从马来古典文学沿袭下来的;使用“低级马来语”的被人称作“低级马来语文学”,它是从市民阶层中产生的,比较通俗化和世俗化,应称之为“通俗马来语文学”更为确切。“高级马来语”和“低级马来语”本质上同属一种语言,只



有雅俗文白之分。“高级马来语文学”与“低级马来语文学”最根本的区别其实不在语言上而在社会属性上。“高级马来语文学”是马来族上层社会的文学,反映的主要是马来封建社会上层阶级的物质和精神生活,其作家多为马来贵族和马来封建文人,读者面比较窄,只限于马来上层社会的范围内。但“高级马来语”是荷兰殖民统治者实行全国政令统一所借助的语言,具有准“官方语言”的地位,而“高级马来语文学”又是受荷兰殖民统治者推崇的文学,被视为马来文学的正统在官办学校里加以推广,所以在知识分子中间影响较大。“低级马来语文学”是殖民地城市的市民文学,反映的是近代迅速发展起来的殖民地城市各族各阶层市民的现实生活和精神面貌。其作家大部分为非马来族的“土生华人”和“土生印欧人”,他们生活在印度尼西亚近代殖民地社会的夹层中,受多种文化的熏陶和影响,所以他们的创作最能反映近代殖民地社会的时代特色。而其读者是全国各城市广大的中下层市民,读者面显然要比“高级马来语文学”广泛得多。然而“低级马来语”一向被殖民地上层社会和荷兰殖民统治者所排斥,被视为不登大雅之堂的粗俗语言。而“低级马来语文学”同样受到歧视和排斥,在一个时期里甚至不被承认是印度尼西亚近代文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企图抹煞它对印度尼西亚文学发展所起的重大历史作用和所做出的巨大贡献。

在印度尼西亚的近代历史中,“高级马来语文学”的进展比较缓慢,其文学成就也比较有限,这与其社会属性有关。“高级马来语文学”的作家主要是依附于封建阶级的文人,他们是在旧传统文化的环境中和熏陶中长大的。他们的思想意识、文艺观点和创作风格仍停留在旧文学的水准上,没能跟上时代前进的步伐而推陈出新。他们创作的作品,无论是内容





还是形式都没有摆脱旧文学的窠臼。沙依尔和希卡雅特仍然是诗歌和散文的主要形式,而内容则远远脱离于近代的现实生活,仍沉溺在神话世界之中。当封建阶级日趋没落时,他们在创作上更难有所作为,只有少数的文人遇上历史的机遇,接触到先进的西方文化并从中得到启迪,才突破了旧思想的樊篱,开始接受新事物。他们以先进的西方文化作为参照系,用新的目光重新审视本民族的传统文化并批判其封建落后性。而第一个站出来进行西方文化启蒙宣传的是著名的马来作家阿卜杜拉·门希。可惜的是,他只是孤身一人在呐喊,没能形成一股新思潮,因而没能从根本上改变“高级马来语文学”的落后面貌。

与“高级马来语文学”形成鲜明的对比,“通俗马来语文学”,即所谓“低级马来语文学”却像异军突起,在较短的时间内就有了迅猛的发展。它是印度尼西亚近代殖民地社会各族各阶层的市民文学,与马来古典文学几乎没有直接的传承关系。“通俗马来语文学”的作家多数为非马来族人,其中最活跃和最有成就的是华裔作家和印欧血统的作家。他们都是土生土长的人,以他们生活其中的近代殖民地社会的现实生活作为他们创作的基础和源泉。所以,他们的作品最贴近近代印度尼西亚殖民地社会的现实,也最能反映近代印度尼西亚殖民地社会的时代特征。

在“通俗马来语文学”中,贡献最大的是华裔作家,他们不但人数最多,成就最突出,且从事创作的年代最长久,从19世纪的下半叶至20世纪60年代,前后延续将近一个世纪。华裔作家可以说是“通俗马来语文学”的主力军,有人把他们创造的文学称之为“华裔马来语文学”(详见下一章)。其次是土生印欧人作家,他们是欧洲人(主要是荷兰人)与土著妇女生





的混血儿,在印度尼西亚土生土长的。土生印欧人在 19 世纪下半叶已逐渐形成印度尼西亚殖民地社会里的一个特殊阶层,介于殖民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间。他们的父亲是享有殖民特权的白人殖民统治阶级,有较高的文化修养,居于殖民地社会“种族界线”之上,可以作威作福。母亲是受殖民统治的土著人,大多没有受过教育,不少是文盲,居于殖民地社会“种族界线”之下,无权无告,任人欺压。在文化上,他们既受来自父系的西方文化的影响,又受来自母系的本土文化的熏陶,使他们的文化具有东西文化相互交融的特点而别具一格。在一个时期里,他们的社会地位没有确定,他们因有土著血统而被纯白人社会打入另册,可土著社会又把他们看做是属于“种族界线”之上的白人社会而不敢接近他们。他们徘徊在两个截然不同的社会中间,被人称作“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人”,既不能随父而享有纯白人的全部特权,又不甘心随母而被人踩在脚下。他们一般掌握两种母语,对父亲讲荷兰语,对母亲讲通俗马来语,这样的社会地位和文化背景造成了他们矛盾和特殊的文化心态。他们在两种文化面前徘徊不定,但作为混血儿他们难于在纯白人的文化阵地上立足,不能很好反映他们这个特殊阶层的心声。于是他们中有一部分人,便开始另辟蹊径,以通俗马来语作为载体去开辟自己的文艺阵地。土生印欧人的通俗马来语文学就这样应运而生了。但他们的文学创作只持续到 20 世纪的头十年,当他们的社会地位得到改善时,大多数人都回到父系的白人社会文化圈里了。从此,他们所从事的通俗马来语文学创作便没有后继者,而进入现代阶段之后更是无声无息了。

无论是华裔作家还是土生印欧人作家的通俗马来语文学,都是印度尼西亚近代殖民地社会的历史产物,他们从一开



始就以印度尼西亚近代殖民地社会的现实生活作为创作的源泉,直接取材于当时殖民地社会的真人真事,使长期脱离现实生活的马来文学回到了现实生活当中。就这点来讲,他们的创作远比“高级马来语文学”更能反映印度尼西亚近代殖民地社会的本质特征,更富有时代的生活气息,而在创作方法和写作技巧上也更大胆地吸收了西方文学的优点,为印度尼西亚文学迈向现代开辟了前进的道路。

第三节

阿卜杜拉·门希和《阿卜杜拉传》

荷兰和英国殖民主义者在东南亚经过两个世纪的角逐与争夺之后,于1824年终于签订《伦敦条约》,最终划定两国在马来群岛的势力范围——马来半岛、新加坡、北加里曼丹归英国,整个印度尼西亚归荷兰。但是在现代民族觉醒以前,就马来文学而言,基本上还是统一的,不为两个殖民势力所分隔,今日的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都把它看做是自己近代文学的组成部分。

划分殖民势力范围之后,荷兰和英国两个殖民国家便致力于各自势力范围内的所谓“前进运动”,即在其殖民势力范围内开展全面殖民化的行动。19世纪上半叶,英国派莱佛士到马来半岛任各邦总督代办。他积极推行“前进运动”计划,在马来半岛大肆扩张其殖民势力,马六甲和新加坡先后成为英国殖民统治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那里不但聚集大批英国的殖民官吏、传教士、商人和人类学家,也招徕了一些马来文人充当各种文职雇员。那些受雇的马来文人与白人朝夕相处,有机会接触和观察白人与他们迥然相异的西方文化和生



活方式。在东西方文化的冲撞和对比中,他们感受到近代西方文化的先进性,从而产生对西方文化的崇慕和向往。他们成为最早接受西方文化洗礼的马来文人,而阿卜杜拉·门希是第一个站出来公开为西方文化大唱赞歌的马来作家。

阿卜杜拉·门希全名为阿卜杜拉·宾·阿卜杜·卡迪尔·门希(Abdullah bin Abdul Kadir Munshi),1769年生于马来半岛南部的马六甲,卒于1854年赴麦加朝觐的途中。他的曾祖父是也门阿拉伯人,是位伊斯兰宗教师和语言学家。其祖父也是宗教师和语言学家,后移居马六甲并与当地宗教师的女儿结婚而生下他的父亲阿卜杜·卡迪尔。父亲继承祖业,也当宗教师和语言学家,同时给英国的语言学家马斯顿当助手。阿卜杜拉·门希就出生于这样的世代书香门第,在他身上有阿拉伯和印度血统,不是纯粹的马来人。他的父亲对他管教极严,从小就让他受马来伊斯兰文化的熏陶和严格的语言训练,14岁已通晓马来语、阿拉伯语和泰米尔语。他又是在英国殖民统治下的殖民地城市马六甲长大的,后来在新加坡长期为白人做事,有机会与许多西方人直接接触。这样的家庭背景和生活环境使他日后能靠自己的语言文化知识在英国殖民统治下自由谋生而不必像一般文人那样依附于封建统治者充当御用文人。

阿卜杜拉·门希于1819年被英殖民者的急先锋莱佛士雇用为他的马来语文书和私人马来语教师。从此他跟随莱佛士从马六甲到新加坡,与英国的上层殖民官吏、传教士、商人、学者等过从甚密。他给好些英国人讲授马来语,介绍马来的社会文化和风俗人情,同时又向那些英国人学习英语,了解西方的文化与科学知识。他接触的英国人多是文化层次较高的人,莱佛士本人就是一位人类学家。他从这些英国人身上感





受到近代西方文化的先进性,看到西方民主、科学和法制精神的一些具体表现,使他对西方文化无比钦佩,赞扬不已。相比之下,他越加感觉到马来封建主的愚昧腐朽以及马来封建文化的落后性,从而对此产生反感和强烈的不满。正因为与马来民族的封建统治阶级没有依附关系,同时又生活在英国殖民统治下的社会并受到英国殖民统治者的器重和保护,他才有可能比较超前和比较清醒地看到马来封建阶级的腐朽性和封建文化的落后性并成为第一个敢公开抨击马来封建统治者和封建旧文化的马来作家。

阿卜杜拉·门希大半生都为英国人效劳,而英国人也一直很器重他,让他参与许多重大的历史事件,使他在时代风云变迁中能亲眼目睹东西方文化的较量和马来封建统治的没落过程。1838年他写的《阿卜杜拉赴吉兰丹航行记》(Kisah Pelayaran Abdullah ke Kelantan)可以说是他的第一部揭露马来封建统治者腐朽本质的作品。这部航行记描述了他从新加坡航行到吉兰丹的沿途见闻,是他第一次离开英国殖民统治下的新加坡前往马来封建主统治下的马来三个州进行实地考察的实录。

1838年他接受信使任务,冒着生命危险前往战火纷飞的吉兰丹州向该州国王递交英国人的信函。他在航行中要经过彭亨州和丁加奴州,也都是马来封建主统治下的土邦。这部航行记主要记载的就是他在这三个马来封建主统治下的州所看到的贫困落后的情景。

在彭亨停留期间,他目睹那里的自然条件虽然很好,但人民的生活却极端贫困和落后。他调查的结果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依我看,彭亨州所以会变成贫穷,主要原因是州内的人经常担心受拉惹(指土邦王——引者)的迫害。拉惹和那班显贵





贪得无厌,因此人们都这样想:我们勤劳有什么用?一旦我们稍为有点积蓄和存粮,就会被那班显贵看上,并被抢走。”“因此他们终身都在贫困和懒散中生活。我敢断言:该州的人不能过愉快和安宁的生活,是因为政令不好。所有祸根都出自拉惹及其亲戚所犯的罪行。我想除此之外,没有其他原因。”他把看到的彭亨封建统治者的残暴专制和社会的贫困落后与他生活的新加坡殖民地社会作对比,他说:“我一直在独立思考,并作比较,我想起人们在英国统治下安居乐业,每个人过着拉惹式的生活,不必互相害怕,也不会互相欺压,因为所有的法律和刑罚都是为了一个大前提,那就是造福人群。”

在丁加奴州他看到同样的现象,那里的土地也很肥沃,百姓却很贫穷。他说:“那种现象的存在,是他们的拉惹暴虐及不善于统治的结果。人们都感到灰心,他们的想法是:我宁可这样穷一辈子,省得麻烦,只要可以度日就够了。假如他们有财产和房子,或者有园丘和大片田地,拉惹就会想尽各种办法向他们索取或借取,若是不给,就动手抢;如若反抗,连其子女都会被杀害或受处罚。这就是丁加奴州不会繁荣的原因,外人都不敢进入,商人更不敢问津。”

吉兰丹州的贫困落后情况有过之而无不及,那里为争夺王位正在进行战争,百姓不堪其苦。吉兰丹州的王位继承权是这样决定的:让几个王子之间去互相厮杀争夺,谁能取胜,他就去继承王位。王子在百姓眼里“简直就像留下恶虎在民间作恶”。百姓向阿卜杜拉·门希诉苦说:“整天都是为拉惹做事,而对我们妻儿的生活概不负责,全部要由我们自己来承担。而且,不论是我们的船,还是庄稼、牲畜,拉惹要的时候,不付代价就被拿走。如果我们家里有财产和漂亮的女儿,一旦被拉惹看上了,就被他拿去或带走。拉惹的欲望是不可阻





止的,有人敢阻止或反抗,就会被刺死。”阿卜杜拉·门希告诉他们:“在英国人统治下人们的生活是如何自由和愉快。”他们听了之后无不羡慕,对阿卜杜拉·门希说:“这就是我们住在马来人的国家里的情况,犹如生活在地狱里一般,所以我们希望搬去洋人统治的地方,以便能过着自由和愉快的生活。”有的人甚至说:“我要请求真主,别让我生长在马来人的国度里,同时让我远离拉惹,因为与拉惹接近犹如与毒蛇为伍。只要有一点差错,眼球就会被它啄掉。”

这部航行记显然不是一般游山玩水的记录,作者几乎没有讲到山水风景和名胜古迹,他把目光完全集中在封建主统治下的马来社会问题上。他看到马来封建社会到处都是贫困、落后和愚昧,并找出了其根源就是封建统治者的专制、暴虐和无道。他能第一个指出封建制度的腐朽本质并预言“他们的王国和他们的习俗最后将会灭亡,他们绝对无法长此下去”。这在当时是不同寻常的,也是很超前的。但是他极力美化英国的殖民统治,把英国殖民统治下的地方视为人间天堂,甚至说出这样的话:“感谢真主,因为我在英国的旗帜下长大,可以过着安稳的生活,不像那些生长在愚昧和险恶环境里的人,要受尽各种折磨和灾难。”在这点上他却完全站错了立场,他看不到殖民统治的罪恶实质。阿卜杜拉·门希这种矛盾的是非观和反封建主义但不反殖民主义的立场贯穿在他后来的作品中,而且表现得更为明显和突出。

阿卜杜拉·门希的代表作是他的传记性作品《阿卜杜拉传》(Hikayat Abdullah)。这部400多页的书是19世纪马来文学中最有分量和最有影响的经典之作。该书序言说,作者是应英国朋友的要求于1840年写的。他的英国朋友是想通过他写的自传去了解马来民族的社情民风。然而,阿卜杜拉写

